

人文
学术

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文库
丛书主编 朱立元 曾繁仁

文学理论：思辨与对话

李衍柱 著

Literary Theory:
Reasoning and Dialogue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丛书主编 朱立元 曾繁仁
执行主编 李 钧

李衍柱 著

文学理论：思辨与对话

Literary Theory:
Reasoning and Dialogue

 復旦大學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理论:思辨与对话/李衍柱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6
(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文库)
ISBN 978-7-309-11397-6

I. 文… II. 李… III. 文学理论 IV. I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80616 号

文学理论:思辨与对话

李衍柱 著

责任编辑/戴文沁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960 1/16 印张 22 字数 346 千

2016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1397-6/I · 910

定价:5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受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委托,我们着手组织“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文库”的编辑出版工作。一开始,我们就想起了十多年前由钱中文、童庆炳两位先生主编的“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那套大型丛书先后出版了三十余位当代中国著名文艺理论家自选的论文集,可以说是对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理论建设和发展的一次比较全面的总结和检阅。“丛书”从2000年第一辑(六本)出版起,已经过去了十五年。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转型又有了巨大的进展,文艺理论的建设也继续经历了激荡起伏的进程。现在再编辑一套文艺学研究丛书,可能历史和现实的语境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变化。考虑到出版周期的原因,“文库”计划先期出版十二本。当前中国文艺理论界有成就、有影响的知名学者远超这个数字,所以我们只能优先考虑“三〇后”“四〇后”学者加盟这套“文库”,但即便如此,目前只能有十二位学者入选,还是难免挂一漏万,这是我们十分遗憾的,也期待在以后的时间里再能陆续出版。

入选“文库”的这十二位学者,基本上都是新时期三十多年来中国文艺理论、批评的全程参与者和见证者。他们的论文集,记录着每一位作者所经历的风风雨雨,所走过的曲折道路,所感受到的深切体验,所获得的宝贵感悟,所留下的坚实脚印,以及靠着艰辛耕耘所取得的学术成就。虽然无法全面反映当代中国文艺学建设和发展的整体成果,但至少也可以折射出它的部分光影,勾勒出它的大致轨迹,对今后文艺学的建设和发展或有些许参照价值,这就是我们编辑、出版“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文库”的缘由。

如果对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学的发展作一个大致分期的话,我们认为,可以分为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以来三个阶段。

20世纪80年代是令后来者怀想的年代。启蒙的激浪,保守的潮汐,新生的欢欣,怀旧的惆怅,都错综复杂地交织于“文革”结束、拨乱反正后我们这一代学人的心灵。70年代末、80年代初“为文学正名”“回归文学自身”的呼吁,冲破了长期以来文艺为政治服务、充当政治工具的禁锢,重新发现和

肯定了文学的审美本性；学界学习马克思《巴黎手稿》引发的人道主义、人性和异化问题的大讨论，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文学是人学”的观念得以确立；声势浩大的“方法论热”和稍后的“文学主体性”问题全国大讨论，在文艺理论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对文学本质的重新思考先后形成了“审美反映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初步框架，为学科在90年代的发展完善奠定了基础。而贯穿上述种种理论探讨、展示时代气象的主线，则是传统文论与西方文论之间充满了争议的碰撞和交融。这一时期，文艺理论界的思想解放集中体现为观念方法的更新和思维空间的拓展。虽然当时及以后批评嘲讽之声不绝，但作为不可改变的事实和一代学人的亲身经历，它实际上塑造了文艺理论家们不同于以往的文化心理结构，这是较之于他们的具体理论成果更为重要的。

经过新时期前十年的理论积淀后，90年代的中国文艺理论界进入了一个多元发展的新阶段。随着西方现当代文论思想被积极引介到中国，一种迫切想与西方学界平等对话的现代性冲动也成为国内文艺理论家们挥之不去的情结。90年代初期，后现代主义同时以哲学和文论的名义登陆国内理论界，就是一个富于意味的信号。由此带来的研究格局也显得流派纷呈，思潮更迭，这是转型期中国在学术文化领域内的必然表征。90年代最值得关注的是1994年前后国内掀起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其主阵地尽管不在文学理论领域，但最初发动是在文学界。由于当时商品经济大潮勃兴后通俗文化、大众文化对高雅文化、精英文化形成巨大冲击，造成文学创作中“人文精神失落”的现实危机，引发了理论界（包括文艺理论界）的广泛反思，由此才催生出新形势下知识分子的人文使命等一系列话题。经过这场大讨论，文艺理论界的研究探索在多个向度上向纵深发展：对文学本质的探讨有了新的进展，“审美意识形态论”获得了较为广泛的认同；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争论成为文学理论建构中深层次的思考；对当代西方文论的译介、研究以及批判性的吸纳始终在争议中前行；与此相关，当代中国文论“失语症”以及“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话题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一直延伸到当今；90年代末，文艺理论界站在世纪之交的制高点上，对整个20世纪特别是新中国五十年文艺学的流变历史和经验得失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和历史的反思，寻找继续前进的正确路径……整个90年代，中国文艺学在新的经济社会语境中闯出了多元发展的可喜局面，如心理学、生态学、接受理论、诸种现代语言学、人类学、比较文化学、精神分析学、结构主义和解构

主义、哲学解释学、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理论学说和研究方法,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和批评方法不断涌入,并与中国文学理论传统既相冲突又相融合,进而广泛应用于文学批评的实践,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文论的多元化展开,有些研究方法还推动了文艺学新学科或学科新分支的建立,如文艺心理学、生态文艺学、文学修辞学、文学人类学、文学解释学、文学叙事学等,极大地丰富了文艺学理论话语和学科形态的建设,使之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

时代终于进入 21 世纪。全球化进程在加快,现代性焦虑在趋深,中国文学理论又迎来一个充满生机的新发展阶段。文化研究蓬勃兴起,冲击着传统文学理论研究格局;全媒体时代的到来,视像文化的异军突起,“日常生活审美化”和“文艺学的文化研究转向”主张的提出,在短短几年里迅速转移着学界的注意力,成为新一轮文艺学关注和争鸣的兴奋点;与此相关,在后现代主义文论积极与消极的双重影响下,围绕文学本质问题,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之争掀起新的波澜;在研究方法上,突破二元对立尤其是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成为越来越多的文艺理论家的自觉追求;对西方文论借鉴的态度比过去更加冷静和辩证,盲目崇拜、亦步亦趋的现象明显减少;“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从 90 年代偏重于理论的探讨转向了务实的尝试和实践,在古代文论与基础理论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下,做出了可喜的实绩;文学基本理论的创新建构和文艺学教材的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标志着文艺理论界多数学者在一系列基本问题上达成了重要共识;网络文学的迅猛崛起,打破了原有的文学作品生成和传播的格局,向传统文学理论发起了挑战,成为当代文艺学无法回避的重要研究课题……比起 20 世纪 90 年代,21 世纪的文艺学发展显得更加沉稳,更加深入,更加扎实。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学的创新发展,始终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突出表现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自觉努力贯穿于这三个时期的始终。我国当代文艺理论批评的标准,从美学的和史学的,到人民的、美学的、历史的和艺术的,体现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新进展和最高成就。由此可见,新时期三十多年来中国文艺学的建设和发展,方向是正确的,主流是健康的。那种把当代文艺理论要么看得危机重重、漆黑一团,要么说成完全是始终跟在西方文论后面亦步亦趋、搞全盘西化那一套的观点,是以偏概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我们所编辑的这套“文库”中的十二本论文集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当然,还远远不够

充分。钱中文、童庆炳两位先生在其主编的“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的总序中曾经预言,“一个理论创新的新世纪已经来临”,收入丛书的众多论文集,“作为丰富的思想资料,它们无疑将汇入新世纪的新的理论创造之中”,21世纪的前十五年已经充分证实了这一点。我们编辑的“文库”,同样希望能够作为当代文艺学的一部分思想资料,“汇入新世纪的新的理论创造之中”,为后来者提供一些参照、启示和借鉴。

“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文库”能够在我国人文学术著作出版困难重重的今天推出,实在是极为难得的。这里,我们必须专门介绍复旦大学出版社的总编辑孙晶博士。是她首先主动向我们提出建议,出一套文艺学研究丛书。她的远见、魄力和眼光令人敬佩。在此,我们代表“文库”的十二位作者,向孙晶总编及复旦大学出版社有关编辑们对中国文艺学建设的鼎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我们不能不为“文库”的作者之一、我们敬爱的童庆炳先生的猝然去世表示最深切的哀悼,并以他今年4月亲自编辑的论文集《文学:精神之鼎与诗意家园》的出版作为我们对他的纪念,以寄托我们的哀思。

朱立元 曾繁仁

2015年国庆节

自序

2014年10月先后接到朱立元、曾繁仁二位先生的电话，邀我为《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文库》选编一本“自选集”，当时在我脑中产生的第一反应，确实有点诚惶诚恐。当代中国从事文艺学研究的老中青学者，成果丰硕而又具有理论创新的学者大有人在，本人取得的成果实在微不足道。但是，盛情难却，我也只能说一句感谢学界老友的厚爱。

“认识你自己！”这是古希腊德尔菲神庙碑上铭刻的一句箴言。这句箴言是生存在地球家园中每一个人都不能回避的一个根本问题，也是每一个人在生命旅途中需要不断回答的问题。从自己已有的成果中选编一本“自选集”，实际上就是一个如何“认识你自己”的问题。“自选集”选得好，读者可以从中领略到你的学术理念、学术道路、学术追求、研究方法、提出的问题与所达到的宽度、厚度和高度。

关于学术理念，我敬仰宗白华先生的那种“生命艺术化，艺术生命化”的人生境界。一个致力于学术研究的人，就应树立：学术生命化，生命学术化的理念。学术研究的目的是追求真理，维护真理，为真理而献身。从事学术研究最主要的内容是学习、学习、再学习。生命不息，学习不止。学习是自己生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向谁学？从孩童时起就知道应向老师学习。谁是老师？我牢记三句话：“三人行必有我师”（孔子）；“转益多师是汝师”（杜甫）；“吾爱吾师吾犹爱真理”（亚里士多德）。谁发现真理、掌握真理，我就向谁学习。既要向古今中外的经典文本即有字的书（包括保留的历史文献和地下出土的文献）学习，又要向社会这本无字的大书学习，在实践中辨别真善美与假恶丑。怎样学的问题，我牢记先贤的教诲：“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辩，辩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

强。”^①学、问、思、辩、行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循环互动、不可分割的生命活动过程。这是一个学与问、情与理、思与辩、知与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执着探求真理打开未知世界大门的过程。在这个生命之流的全过程中,不管处于何种情况下,我们的头脑中都应有问题意识和怀疑精神。禅学中的所谓“小疑则小悟,大疑则大悟,不疑则不悟”,是人生体悟之真言。启蒙运动的美学家狄德罗说过:“迈向科学的第一步就是怀疑。”在选择治学道路的过程中,我非常赞赏蒋孔阳先生的那种孜孜不倦地在浩瀚的生活海洋和书的海洋中去探索追求真善美、“让真理占有我”的精神;他的那种海纳百川、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综合创新的治学品格;他的那种虚怀若谷、有容乃大、无欲则刚、提携中青年学者的忠厚长者风范。蒋先生的学术理念、治学品格和大家风范,我们后继者应努力学习,加以弘扬光大。

回顾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我庆幸自己生活在一个急剧变革的伟大时代。从1956年9月踏入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之日起,我已跨进了文学和文艺学的大门。1961年7月又经过推荐考试,我被正式录取为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文艺理论研究生班(简称“人大文研班”)的研究生,1964年7月毕业。这三年研究生的学习生活,是我永生难忘的一段美好时光。中国文学研究所所长、著名诗人和文艺理论家何其芳先生亲任我们“文研班”的班主任。先后给我们授课和指导毕业论文的教师,都是全国一流的专家、教授,如宗白华、蔡仪、缪朗山、何其芳、余冠英、游国恩、冯至、吴组缃、季镇淮、唐弢、刘绶松、周振甫、张光年、冯牧、侯金镜、李泽厚、叶秀山、冯其庸、何思敬、马奇、戈宝权、叶水夫等。能够亲自聆听这些大家的讲课,这是人生的幸福。正是他们,才真正把我引进了知识的海洋,走到了学术的前沿,正式进入了中国文艺学、美学研究的学术殿堂。他们的学术理念、治学方法和治学态度,他们卓尔不群的创作个性和学术见解,大大开阔了我的眼界,打开了我长期被封闭的思想闸门,使我逐渐领悟应当学习什么,怎样学习,应当走一条什么样的学术道路。

在中国人民大学“文研班”学习的最后一年是撰写研究生毕业论文,我选的题目是《学习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中的典型问题》,指导教师是中国当代著名美学家蔡仪先生。跟着蔡先生做毕业论文,受益匪浅,从学风、研究方法、叙述方法、论文结构、语言修辞等方面,我学到了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论文撰写过程中我遇到和提出的疑难问题,他都耐心地一一作了

① [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1页。

回答(详见《林涛海韵丛话》一:《文学典型论》,人民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第419—425页)。在蔡仪先生的教诲和影响下,我一直抓住典型问题不放,中间虽然因“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断了十几年,但我还是默默地在为自己掘一口井,直到把它打出水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先后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概述》和《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史纲》,后者通过专家审定被国家教育委员会推荐为全国“研究生教学用书”。1992年由齐鲁书社出版了《文学典型论》的姊妹篇《文学理想论》。由此,我体会到,以锲而不舍的精神,抓住一点,触类旁通,联系实际,深入系统地进行研究,不失为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科学研究的方法。

从1960年9月——2014年9月,我踏入文艺学、美学的门槛,从事教学与研究,已半个多世纪。在我的学术生涯中,若从研究对象的内容来看,可分为两个阶段:前30年(包括“文化大革命”10年)学术的着眼点和主要精力用在“典型——理想——范畴”六个字上面。1996年由我主编的《文艺学范畴论》正式出版后的20年,急剧变化的时代大潮和对新的千禧之年的期待,驱使我、吸引我将学术目光聚焦在“信息时代的中国文艺学”这一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上面。世纪之交文学、文学理论的时代是真的“终结”了吗?中国文艺学、美学将向何处去?路在何方?问题出在哪里?如何认识当今时代文艺学美学所面对的现实?等等问题,几乎日夜萦绕在心头。我深感有必要对文艺学建设的这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做些系统的梳理、反思和研究。于是我便遵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文学和时代”为中心命题,开始了一系列理论问题的探索。读者可以从2000年出版的《时代的回声——走向新世纪的中国文艺学》中,看到我如何追踪文艺学研究前沿性的社会转型与文艺学发展态势、思想解放与文艺学建设、文艺学研究方法的变革、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历史命运、传统与现代、人论与文论、对话与独语等八个问题,在吸收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尽力发出了一点自己的声音,谈了些不同于别人的新见解。

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自己又结合急剧变革时代出现的社会革命、科技革命、媒介革命、绿色革命给文艺学、美学研究提出的新问题和出现的新特点,从“马、西、中”三个不同而又相互联系的学术领域,综合比较,探讨中国文艺学、美学的发展态势和走向,尽力对我们应面对的问题作出自己的回答。新世纪以来,围绕“信息时代与中国文艺学建设”这个总题目,先后撰写了《文艺学方法论的革命——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导言》《主导多元 综合创新:论当代中国文艺学发展的基本态势》《多元共生 和而

不同——新世纪文艺理论的走向》《范式革命与文艺学转型》《文学理论:面对信息时代的幽灵——兼与J·希利斯·米勒商榷》《艺术的黄昏和黎明》《数与美绘制的时代镜像》《网络文学:通向自由理想境界的艺术形式》《媒介革命与文学生产链的建构》《生态美学何以成为一种美学?》《生态美:世界美学家族中的新成员》等论文。自己力图站在时代的高度,以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联系中外文艺发展的实际,具体阐释信息时代引起的文艺学、美学的范式革命;从理论上批评和回答某些西方学者鼓吹的“历史终结论”“文学终结论”;总结中国现代文艺学建设的历史经验,概括地提出新世纪文艺学的走向和当代中国文艺学发展的基本态势是:“多元共生,和而不同”与“主导多元,综合创新”;认为传统与现代转换已形成三条不同路径:朱光潜的“移花接木论”;宗白华的“东西古今”“融会贯通论”;钱锺书的“打通论”和“阐释之循环”。这些见解,已引起不少学人的共鸣。

2002年9月我的第一本自选集《经典文本与文艺学范畴研究》,作为钱中文、童庆炳先生主编的“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之一由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选了1978—2002年间公开发表的13篇论文;2003年3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路与灯——文艺学建设问题研究》,收入2002年以前发表的29篇论文;2013年1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五卷本文集《林涛海韵丛话》,编选了我学术生涯中自以为还有点保留价值的专著和论文。如何从已出的两本自选集和《林涛海韵丛话》的基础上再编选一本新的自选集,理应选择一个新的视角,有点新的内容。我着重考虑的有三点:第一、以“走向新世纪文艺复兴之路”的视角,选择自己从上世纪末以来,围绕“信息时代与中国文艺学建设”这个大题目,在理论上所做的探索与留下的印迹。第二、结合中外诗学美学经典文本的研读,选一点有点新意的成果。200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西方美学经典文本导读》。在成书过程中,先后发表了十几篇有关研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维科、歌德、康德、黑格尔、巴赫金等文化巨人的美学诗学思想的论文。这其中有的论文的确下过笨功夫,具有一定的创新性。2006—2007年为了筹备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与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联合召开“儒家思孟学派国际学术研讨会”,两次去哈佛大学访问,并在燕京学社图书馆查阅了大量有关思孟学派的文献资料,回国后撰写出《思孟学派与中国美学》的长篇论文。第三、理论与实践结合,从文艺批评切入,努力使文艺学美学建设“接地气”。一是联系20世纪中国文艺学美学研究的实际,概括出“中体西用”“全盘西化”“西体中用”“综合创新”等几种主要范式。重点研究和阐释了宗白华、蒋孔阳先生的文艺学美学思想和他

们对文艺学美学的中国道路的开拓。二是联系 21 世纪第一个 10 年中国文学的实际,发表了《〈蛙〉:生命文学的奇葩》和 8 篇评论孙皓晖《大秦帝国》的论文,2011 年 7 月河南文艺出版社推出我的文艺批评专著:《〈大秦帝国〉论稿——走向新世纪文艺复兴的绿色信号》。在对作品鉴赏批评的过程中,使我对当代中国文学形成了一个基本的看法,我认为:《大秦帝国》的出现,是中国文学艺术走向大发展、大繁荣的可喜征兆,是中华民族走向新世纪文艺复兴之路的绿色信号。莫言的《蛙》的问世,标志着中国文学在攀登世界文学巅峰的征程中又跨上了一个新的里程。

新选编的这本自选集《文学理论:思辨与对话》,凸显了时代特色和新世纪以来我的学术研究轨迹。内容包括三部分:辑一 信息时代与文艺学建设,选入《文学理论:面对信息时代的幽灵——兼与 J·希利斯·米勒商榷》《主导多元 综合创新——论当代中国文艺学发展的基本态势》《范式革命与文艺学转型》《科学的发展与文艺学现代性研究》等 8 篇论文;辑二 回归经典文本圣地,选入《重读黑格尔——黑格尔〈美学〉与中国文艺学建设》《“思孟学派”与中国美学》《柏拉图的诗论六说》等 5 篇论文;辑三 美的探索与文艺批评,选入《第十个文艺女神的再生——关于文艺批评的主体性的思考》《世界本体论美学的肇始者——柏拉图提出和论说的美学问题》《美的规律与典型化原则》《巴赫金对话理论的现代意义》《胡适:中国禅学的拓荒者与建设者》《生命艺术化,艺术生命化——宗白华的生命美学新体系》《综合创新:美学的中国道路——谈蒋孔阳先生对中国美学建设的贡献》《〈蛙〉:生命文学的奇葩》《弘扬中华原生文明的悲壮史诗——评孙皓晖的〈大秦帝国〉》《真善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 10 篇论文。这本自选集共入选论文 23 篇,其中新世纪以来撰写的有 19 篇,读者从中可以窥视出作者从事学术研究的轨迹和概貌。

这本《文学理论:思辨与对话》自选集,得以立项、成书和出版,首先应感谢同行专家的推荐和朱立元、曾繁仁二位先生的关照,感谢人民出版社给予的支持,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的鼎力相助,感谢山东师范大学省级特色文艺学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杨守森教授对本书所选内容和体例提出的宝贵意见,同时对责编戴文沁的辛勤劳动和付出,对研究生秦叶、张祎明在所选论文的文字校对、校正和格式调整等方面给予的帮助,表示真诚的谢意。

李衍柱 2015 年 1 月 24 日

目 录

自序	001
----	-----

辑一 信息时代与文艺学建设

文学理论:面对信息时代的幽灵	
——兼与J·希利斯·米勒商榷	002
数与美绘制的时代镜像	020
主导多元 综合创新	
——论当代中国文艺学发展的基本态势	026
范式革命与文艺学转型	033
多元共生 和而不同	
——新世纪文学理论的走向	040
媒介革命与文学生产链的建构	051
科学的发展与文艺学现代性研究	066
文学理想:一束普照人类心田的希望之光	085

辑二 回归经典文本的圣地

重读黑格尔	
——黑格尔《美学》与中国文艺学建设	094
精校经典文本与“聊斋学”的发展	115
“思孟学派”与中国美学	136
“线喻”“洞喻”“床喻”和柏拉图的世界图像论	172

柏拉图的诗论六说

179

辑三 美的探索与文艺批评

第十个文艺女神的再生

——关于文艺批评的主体性的思考

202

世界本体论美学的肇始者

——柏拉图提出和论说的美学问题

214

美的规律与典型化原则

231

巴赫金对话理论的现代意义

247

胡适:中国禅学的拓荒者与建设者

259

生命艺术化,艺术生命化

——宗白华的生命美学新体系

269

综合创新:美学的中国道路

——谈蒋孔阳先生对中国美学建设的贡献

281

《蛙》:生命文学的奇葩

292

附 莫言致李衍柱的信(2011年10月3日)

305

弘扬中华原生文明的悲壮史诗

——评孙皓晖的《大秦帝国》

306

真善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23

辑一 信息时代与文艺学建设

◎ 文学理论：面对信息时代的幽灵

——兼与J·希利斯·米勒商榷

◎ 数与美绘制的时代镜像

◎ 主导多元 综合创新

——论当代中国文艺学发展的基本态势

◎ 范式革命与文艺学转型

◎ 多元共生 和而不同

——新世纪文学理论的走向

◎ 媒介革命与文学生产链的建构

◎ 科学的发展与文艺学现代性研究

◎ 文学理想：一束普照人类心田的希望之光

文学理论:面对信息时代的幽灵

——兼与 J·希利斯·米勒商榷

一

在新的世纪,文学的时代是否已经终结?文学研究的时代是否已经成为过去?对于作家、艺术家和文学理论工作者来说,这是一个关系到文学艺术和文学研究存在还是消亡的生死攸关的根本问题。

关于“艺术的终结”在西方已争论了几十年,到 20 世纪最后年代,可能与流行的“世纪末情结”有关,这个问题又突出地提了出来。

雅克·德里达在《明信片》一书中说:“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影响倒在其次),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德里达断言,“电信时代的变化不仅仅是改变,而且会确定无疑地导致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甚至情书的终结。”^①作为德里达的信奉者、美国文艺理论家 J·希利斯·米勒于 2000 年秋在中国语言文化大学召开的“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也直言不讳地宣布称他是赞成德里达的“文学终结”论的。他说:“事实上,如果德里达是对的(而且我相信他是对的),那么,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concomitans)而把它引向终结。”^②随着文学时代的“终结”,米勒进一步发挥了德里达的思想,说:“那么,文学研究又会怎样呢?它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再也不会出现这样一个时代——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撇开理论的或者政治方面的思考而单纯去研究文学。那样做不合时宜。”^③

① 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 年第 1 期。

② 同上。

③ 同上。

德里达、米勒的文学时代“终结”论，从历史渊源上讲，可以追溯到黑格尔。美国当代文艺理论家弗·詹姆逊明确指出：“关于‘历史的终结’的论争，假定它仍存在的话，似乎已经从其前驱者的记忆中驱除出去了，而关于‘艺术的终结’的论争，在30年前的60年代曾讨论得十分热烈，现在看来也似乎不可思议了。如果你愿意承认的话，这两种论争都来自黑格尔，并通过他对历史的思考，或他以历史叙述的形式再现了一个特有的转折：我相信我们现在已经沿着我们所意识到的这种历史性的叙述结构走得很远，从而能够忘却那些带有总体性或目的论弊端的古老的坚果。”^①詹姆斯还联系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社会围绕福山写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一书，展开的热烈论争，说明黑格尔并非像人们通常所说的和想象的那样成为过去。我们知道，黑格尔在他的美学巨著中，精心编织了一个理念自我运动、转化而又回复到自身的花环，他说：“每个民族文化的进展一般都要达到艺术指向它本身以外的一个时期。”^②黑格尔把世界艺术史同样看作是一部理念自我循环的历史，认为它沿着象征主义——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的轨迹运行，“到了喜剧的发展成熟阶段，我们现在也就达到了美学这门科学研究的终结。……到了这个顶峰，喜剧就马上导致一般艺术的解体。”^③艺术则被宗教和哲学所取代。因此艺术永远属于过去。黑格尔关于艺术的“解体”论和“取代”论，一方面反映了他的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与辩证法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他又以哲学家的敏感，看出了资本主义同文学艺术发展的敌对的性质。他明确说，“我们现时代的一般情况是不利于艺术的。”^④黑格尔的这一思想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显然具有批判的意义，并且直接影响了马克思。我们所熟知的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的观点，显然是同黑格尔的观点相通的。

文学时代的终结和文学研究的时代永远成为过去，究其现实的社会心理的原因是与当今世界出现了一个德里达所说的幽灵家族的新成员、这就是信息的数码图像有关。在德里达看来，游荡着在人类世界的“幽灵们”有许多成员，当然萦绕在西方有产者心头并使他们一直为之心悸的是“马克思的幽灵们”，“今天，在几近一个半世纪之后，全世界范围内为共产主义的幽

① [美]弗·詹姆逊：《文化转向》，胡亚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2页。

② 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32页。

③ 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册，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34页。

④ 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4页。